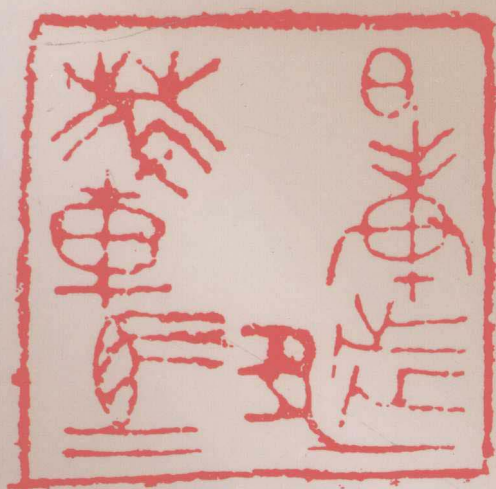


古代铭刻论丛

叶其峰 著



文物出版社

古代铭刻论丛

叶其峰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张 丽

责任编辑 贾东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铭刻论丛 / 叶其峰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010 - 3583 - 0

I. ①古… II. ①叶… III. ①古印 (考古) - 文集
IV. ①K877. 6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3123 号

古代铭刻论丛

叶其峰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政 编 码: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23.25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583 - 0 定价: 160.00 元

序

在当代古玺印研究领域中，叶其峰先生是有成就的专家，叶先生治古玺印学有年，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先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任职期间，就曾协助前辈学者著名古玺印专家罗福颐先生编著了《古玺文编》、《古玺汇编》及《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三部巨著，这三部集大成的著作作为研究先秦古玺、古玺文字以及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贡献了有关古玺文字的释读、古玺的分类、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的断代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印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这三部著作已成为印学界的案头必备之书。除此文外，叶先生还著有《古玺印通论》、《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这两部著作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古玺印以及鉴定古玺印的基本知识，是一般文物考古工作者学习和研究古玺印的重要参考读物。

在古玺印的专题研究方面，叶先生也对许多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古玺的分国问题，战国成语玺释义，战国官署玺以及古玺印的性质和起源，西汉官印的分期及田字格官印的年代断限，汉魏晋少数民族官印考证，秦汉南北朝官印的鉴别方法，汉代肖形印的内容及其艺术特色，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护军、中护军印以及汉魏南北朝官印随葬制度与随葬印等等，在这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中，叶先生都取得不少重要的成果。现在叶先生将这些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收集起来，结集成书出版，嘉惠学林，相信一定能对古玺印的研究起到促进的作用。

需要顺便一提的是，在这本论文集中，除了玺印论文之外，还收有几篇论述石刻的文章，从这类文章里，读者可以了解叶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造诣，同时也可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知识。

叶先生将这部大作付梓之际，嘱我写序，作为叶先生的老友，义不容辞，因而写了以上一些话，权当序言，希望能不负所托。

王人聪

2012 年 1 月 3 日

目 录

序	王人聪
古玺印述略	(1)
古印收藏与古印收藏家	(9)
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	(20)
战国官署玺	
——兼谈古玺印的定义	(29)
战国氏名玺国别探析	(40)
战国语辞玺析义	(76)
古玺篆刻艺术	(81)
西汉官印丛考	(86)
新莽官印鉴别例	(103)
对若干汉末至南北朝将军及相关武职官印的考察	(109)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护军、中护军与护军印	(144)
两汉魏晋的周边民族及方国官印	(152)
汉魏南北朝官印随葬制度与随葬印	(184)
秦汉南北朝官印鉴别方法初论	(197)
秦汉语辞印	(226)

封泥“黄神越章”及相关古印	(229)
汉肖形印的题材内容及其艺术特色	(240)
简论“契丹节度使印”的年代	(254)
故宫藏元八思巴字印及相关问题	(258)
明宝“丹符出验四方” ——兼谈明宝玺沿革及相关制度	(263)
珍秦斋藏古玺印的学术价值	(269)
《大风堂藏古印举》序	(275)
浅谈商代书法艺术	(278)
故宫藏石两种	(286)
于景墓志再考释	(292)
《曹真碑》新考	(300)
晋石勒墓志 ——兼谈墓志制度之演变	(308)
刁遵先人及刁氏家族的兴衰 ——读刁遵墓志铭	(315)
北魏赵郡李氏的人和事 ——读李宪墓志	(329)
隋元智墓志涉及的史事及其用典	(341)
主要论著目录	(359)
后 记	(363)

玺略小，印面多不及方寸；其钮式，或为鼻钮，或为背面有台的坛钮。官署玺的形制就较复杂，而且其形制与用途有关。如木材仓储用玺“左桁禀木”，形如筒，中空可纳木，此玺显然是为烙木而专门制作的。

战国的统治者很重视对官玺的管理，特别是对官名玺，任官授印、免官收印已是当时普遍实行的制度。战国时期各国对官玺颁发对象、管理的规定，及官玺之形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成为秦汉南北朝官印制度的基础。

战国私玺遗存实物及见于前人所集印谱者超过五千枚，可分为氏名玺、语辞玺、肖形玺三大类。

氏名玺绝大多数是氏名俱有，但有的仅镌氏，如“邱”玺；有的仅为名，如“珂”玺。氏名玺过去多称姓名玺，按古人习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祖先谥号为氏，以封地、居址为氏。反映在私玺中，就有不少官名、爵名、地名，甚至是居所名。这些名称，是“氏”而非姓。

语辞玺（习称成语玺）是指镌刻箴言、吉祥语词的印章，以其内容则可分为箴言玺、吉语玺两类。箴言玺主要是讲修身的，其内容，有关于对礼制、国事、国君态度的，有如何与他人相处的，有如何约束个人行为的，还有从生活中总结出来具有哲理性质的语词。箴言玺多数贯穿着儒家“克己复礼”、“仁”的宗旨，体现了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

吉语玺数量很多，镌刻的都是关于财富、仕途、健康长寿或家族发展的语词。吉语玺有的为生人所佩，有的应为随葬品，然都属吉祥辟邪之物。吉语玺的大量行用，表现了古人对幸福的理解和对生的渴望。

肖形玺是指镌刻图像或图文并用的印章。这类印章至迟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战国肖形玺多镌刻生动的动物图像，时代特征十分鲜明。

作为早期印章，无论是官玺还是私玺，其质地、钮式、文字篆刻均无定式，显得多样而活泼。从传世遗物考察，官玺的质地主要有铜、玉、陶三种，玉玺的使用与官品无关，陶玺则为工官所用。私玺的质料亦以铜为主，然玉、玛瑙、象牙、琉璃亦有所见。实际上，战国时期人们对自用玺印的选材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正如《汉官仪》所述：“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铜官玺的钮式主要有鼻、坛、橛、圆筒几种，玉官玺则为覆斗钮。印体主要为方形，少量作圆形、长条形。当时人们对官玺钮式、印形的选择主要基于使用的方便，但在印钮形状方面，已体现出人们对美的追求，这一点在私玺中最为突出。私玺的钮式、印形也完全是“各服所好”的，铜玺中有鼻、坛、亭、鸟、橛、带勾等钮式，印体更有方、圆、长方、椭圆、半圆、心形、月牙、矩形诸状。与官玺相同的坛钮、鼻钮，其制作工艺也普遍比官玺工致许多，至于故宫博物院所藏两枚玉质小玺的舞人钮、兽钮，更是精美绝伦的玉雕了。

古玺使用的文字都是当时流行的文字，即战国古文，但其装饰性比同时期的简书、

帛书、盟书、金文强。根据印面构图的需要，或增笔，或简省，或合文，或偏旁移动、倒置；字形或端庄，或欹斜，不拘一格。即使是官玺，制作者也毫不囿于其作为权力凭证的庄严，而刻意追求印面的美感。更由于国别不同、功能不同，在制作上又有铸造、刻凿之分，古玺的镌刻风貌由此千姿百态。玺文的峻异多变，布局的空灵巧妙，由此而形成的风格上的奇崛多姿，是古玺基本的艺术特色。

我国印章的各种类型，古玺都有了；印章的各种要素及其镌刻方法，古玺基本具备了。它为我国印章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其多彩多姿的篆刻风格更对后世篆刻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 秦汉南北朝印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官私印章是在古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面貌的印章系统。它起始于秦，成熟于汉，衰落于南北朝，我们称之为秦汉印系。秦官印主要是指秦王朝颁发的官印，楚汉相争时，楚汉两个政权都颁发过官印，因此，目前存世的秦官印，有可能含有秦汉之际的遗物。秦官印在名称、质材、文字、印面构图方面，均受到秦统一政策的影响，由于整齐统一，无战国官玺之多姿，却扬弃了前者之芜杂；在名称方面，改变了战国时期称印为玺的习俗，只有帝后印称玺，其余百官印均称印；在质材方面，只有帝后玺方可用玉；在形制方面，印方，边长约一寸，印背平或略隆，鼻钮，其形近战国官玺中的官名玺；在文字方面，均用小篆，其形类秦权量文字，笔势自然，均阴文，绝无阳文印；在印面方面，均施界格，印文镌于格内；在印文排列方面，虽无官玺活泼，然却有右起上下读、右起横读、右起交叉读、左起交叉读等排序，亦很不统一。总的来说，秦官印仍保存着不少战国官玺的成分，但它确是一种具有独特面貌的印类，是我国官印形制从幼年型的官玺向成熟型的汉官印的过渡形态。秦王朝对官印的等级、形制的基本规定（如边长一寸、阴刻、篆书等），及其对官印权力象征的强化，均为汉魏南北朝所继承。

两汉官印遗存甚多，有传统的官名印、官署印，有给少数民族及周边方国的官印，还有大量类似官印的印章，如民间组织所用的祭尊印、单印、唯印、镌有官名的随葬印等。

汉代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官印制度。这套制度是在秦制基础上逐步补充、完善的，它是汉印成熟的标志。根据文献记载及对遗存实物的考察，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等级制度。大致可分为六个等级，每个等级官吏使用的官印有若干差别。一等，帝后印。特点：白玉质，螭虎钮，称玺；二等，王印。特点：金质，龟钮，称玺；三等，列侯、丞相、大将军、太子印。特点：金质，龟钮，称印或章；四等，秩级中二千石，二千石印。特点：银质，龟钮，称印或章；五等，秩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印。特点：铜质，鼻钮，称印；六等，秩级二百石以下小官印。特点：铜质，半通（大小

为普通官印之一半),鼻钮。

二、管理与使用制度。规定皇帝用印有六种,即所谓“乘輿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每枚御玺均有明确的使用范围。另一枚秦始皇传国玺,被视为代表皇权的镇国之宝,藏而不用。汉制规定每一皇帝即位都要举行隆重的授印仪式,皇帝受玺后始为合法。御玺由专官管理(西汉称“尚符玺郎”,东汉称“尚符玺郎中”)。其他官吏授印也有仪式,在管理上也和战国时一样,随身佩带,迁官或官在任上死亡必须将官印上缴。

三、随葬官印制度。西汉对官印随葬控制甚严,死后可以随葬实用官印的,仅限于皇太后、皇大太后、皇后和皇帝特别宠信的大臣。东汉略宽,“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葬”也“皆赠印绶”。至于其他任官印信,除皇帝特准者外,是不可用于随葬的。

四、用字及镌刻制度。规定官印字体为摹印篆。通官印一般为四字,称印;西汉武帝太初元年规定秩中二千石及二千石官印用五字,称章,遂成定制。新莽官印用字数量与两汉不尽相同,其官印均五字或六字以上,而无四字印。

对于已经形成的官印制度的执行,两汉不同时期有宽严的差别。东汉中期以后,卖官现象十分严重,所卖之官多虚职,如“关内侯”、“奉车都尉”等,此类官印的质地与制度多不相符。至于钮式、印文风格,由于审美观念不同,西汉初、西汉中后期、新莽、东汉初、东汉中后期均有差别。但是,西汉中后期,即武帝以后,基本是按照上述制度制作官印和进行管理的。

魏晋时期的官印制度完全承袭两汉的传统,印章形态、印文风格与东汉晚期印不易区别。

中央朝廷给周边少数民族及方国的官印在遗存的两汉魏晋官印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汉给少数民族官印涉及滇、越、匈奴、鲜卑等十多个少数民族,颁发对象上至王侯,下至千长、百长等各个阶层。汉给少数民族政权颁发官印起于汉初,盛于汉宣帝时匈奴内迁以后。汉武帝以前给少数民族官印均无“汉”字,加“汉”应在宣帝以后。钮式一般也与普通官印无别(“滇王之印”为蛇钮属例外)。新莽给少数民族官印钮式也与普通官印同,然印文第一字均为“新”字。东汉立国以后给周边少数民族及方国的官印制度是:其钮式依颁发对象的民族特点分别用驼钮、兽钮或蛇钮,而不使用本期官印的龟钮、鼻钮。印文首字均镌一“汉”字,而后才镌族名、官名,有的印章在官名前加“率众”、“保塞”等溢美之词。这一制度为魏晋所沿用。遗存的魏晋政权给少数民族官印甚多,特别是晋印,涉及民族之多、遗存数量之大,为各朝之冠。两汉魏晋给少数民族颁发官印反映了各朝的民族政策,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产物。

南北朝官印的制作以北朝印为精,但是这个时期由于政权更迭,国家分裂,连年战乱,汉代形成的官印制度不能不受到冲击和破坏。作为皇权象征的“乘輿六玺”制

动摇了，北齐皇帝居然镌刻了一枚称作“督摄万机”的硕大木印作为日常发布诏令的用玺；汉以来官印专用字体摹印篆也无人重视，南朝印文刻凿十分草率，北朝印文则多硬直放纵，完全失去了汉晋官印文字那种端庄典雅的韵味；南北朝政权也不严守官印必用龟钮、鼻钮的传统，南朝有用碑状的环钮代替鼻钮，用各式各样的兽形钮代替龟钮。印面也不仅仅是方寸，篆刻亦不仅仅用阴文，阳文大官印开始在当时的帝后和地方政权使用。总之，行用了数百年的秦汉印系到南北朝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南北朝是秦汉印系的衰落期、终结期，也是我国官印的变革期，新的钮式之出现，特别是阳文大官印之应用，昭示着新的官印形制即将诞生。

秦汉南北朝私印的嬗变进程与官印是同步的。存世的这个时期之私印绝大部分属秦汉时期，其中又以汉印为最多。秦汉南北朝私印亦可分姓名印、语辞印、肖形印三大类。

古玺中奇奇怪怪的“氏”在秦汉姓名印中已不多见，这是我国秦汉以后姓氏合一习俗的反映。秦汉以后姓名印是真正的姓名印。秦姓名印的印制也和当时官印一样，受到秦统一政策的影响，质材、形制均比较单一。秦铜私印有正方、长方、圆、椭圆四式，多坛钮，圆形坛钮印形如秤砣。穿带印也有一定数量，其中椭圆形穿带印很有特色。印面有界格，印文镌于格内。制作均很精致。汉姓名印中的质材、钮式比秦印要丰富得多，这不仅是因汉代时间长，主要还是两汉较长期的国家安定、百姓生活富裕的反映。汉姓名印有铜、玉、银、木、石、琉璃等多种，印钮则依据质材和个人的喜好采用覆斗、坛、瓦、桥、龟、虎、象、辟邪、鸭嘴兽、雁、橛、带勾等多种样式。汉代还流行龟钮和辟邪钮的子母印，母印中空，子印置于母印空处，两印一套或三印一套，母印、子印各雕钮的一个局部，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完整精致的印钮。设计之巧妙，令人叫绝。

语辞印中的箴言印数量不多，内容单调，儒家思想的语词几乎绝迹。然吉语印却甚多见，其语词尽管主要还是有关财富、安康的内容，但词汇相当丰富，有的印文竟达数十字之多。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吉语印中还出现了有关男女情爱、思念的新内容。汉语辞印中箴言、吉语比重的变化，内容上的变化，无疑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国家统一后人们的心态密切相关。

汉代肖形印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刻画之精，空前绝后，是这一印类发展的顶峰。汉肖形印的内容可分为人物活动、神话传说、奇禽异兽、祥瑞动物四大类，或取材于远古传说，或表现现实生活中某一断面，内容十分丰富。

秦汉南北朝篆刻艺术达到很高的成就，特别是巅峰期汉代印章的篆刻，至今仍是我国篆刻艺术的楷模。这时印章使用鸟虫书、悬针篆、摹印篆等多种书体。前两种书体装饰性很强，属美术字体，均见于私印；摹印篆属小篆系统，但笔画、字形与小篆均有区别，是汉摆脱秦印影响以后专用于刻印的一种书体。官印必须使用摹印篆，私人印章也普遍使用。汉摹印篆以笔画苍劲雄健、体态方圆相兼、宽博浑穆为基本特征，

只是由于不同时期人们审美观念的差异，其笔画、字形很不一致。有的笔画匀称，使转方折，字形长，结体略显疏朗；有的笔画苍劲雄健，字形方整，结体严谨；有的笔画圆转，起笔收笔略呈尖状，字形方中略呈圆势；有的笔画粗肥，两端平齐，遒劲中又具柔婉风韵，方圆相兼，宽博浑穆，庄严大度；有的笔画匀称，字形长，然又略呈圆转之势；有的线条平直、方折，字形方而具隶书风采。媚丽多姿的篆体，配以精心的印面布局设计，使汉印的篆刻艺术达到极致的程度。特别是汉代姓名印，印文笔画长短的搭配，每字形所占空间的位置，多经缜密的构思。有的印面文字阴阳相间，有的配置四神，更是秀美雅致。

汉肖形印的艺术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它类似当时的画像石、画像砖，内容广泛，图像生动，是袖珍式的汉画。从技法上，肖形印可分铸印、凿印、线刻印三种。铸印的图像是用翻砂法或失蜡法与印体一同铸出的，均阴纹，阴凹里部又多有细致的刻纹，如将此类阴纹肖形印按照古人用印的方法抑印在胶泥上，立刻就会出现一个立体感很强的小型浮雕。这种浮雕是在普通印谱中所绝对看不到的，其美妙之处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凿印乃直接在铜印中刻凿图纹，作者追求的是物象姿态，而无细部的精心刻划，它质朴如同剪影，古拙而洗练。线刻印多是兽鸟图像，作者通过线条的变化表现各类动物的神态，图像简略却十分传神。

我国篆刻艺术到了汉代已是相当成熟，汉代印章不愧为我国篆刻艺术的宝库。

三 隋唐至清代印章

我国印章制度到了隋唐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隋及清，逐渐成为一种与传统差别甚大的印章系统，我们称之为隋唐印系。

隋唐印系与秦汉印系的区别是多方面的。在官印的颁发对象方面，隋以前的官印主要是官名印，官署印只用于低级的行政机构或某机构的职能部门；隋以后各朝就不同了，重要的地方行政机构、军队中的重要部门都有官署印。隋以后各朝官署印的大量遗存，和这些官印所署官府之权大位重，表明从隋开始，各朝已把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印从发给任官本人的官名印转移到颁发给官府的公章——官署印上。这是我国官印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化。

在官印形制方面，它一反传统印面方寸，龟、鼻钮，阴刻的印式，而以印大、钮高、阳文为基本特征。印制的改变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的。汉以前人们用竹木材料书写，皇帝、官府下达文书，都是写在竹木简册上，包裹好后在包扎处涂以泥，然后钤盖官印。这种使用官印的方法，就决定印体不能过大，印钮不必过长，为使泥封上的印文凸显易看，印文必须阴刻。到了隋唐，纸张早已作为代替竹木的书写材料被广泛应用，印色也于南北朝中期发明并被引用到官印的钤盖上，人们注意到在宽阔的纸张上钤用传统的方寸阴文官印很不醒目，为使象征权力的官印更具震慑的力量，印

体加大，朱色阳文就势在必行。为铃用时方便易握，印钮也相应加大加长了。

此期官印文字再也不是传统的摹印篆。隋唐官印的篆体笔画圆转婉曲，印面布局疏朗。宋印笔画则改婉曲为盘曲，印面布局改疏朗为茂密。金印又改圆转为平直，更强化宋印的盘曲而形成一种以折直盘叠为特征的九叠篆。此种篆体影响及清，成为金元以后官印文字的主流。这个时期入主中原或建立了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也相继颁发了镌有本民族文字的官印，更是此期官印的一大特色。官印背面刻款于宋代始形成制度，边款则始见于金印。最初的官印刻款是刊刻该印的铸造机构和铸造时间，金印增加了文字内容的对译，为防作伪，又加刻了千字文编号。元明官印的刻款内容和方式与金印基本相同，但至明末又改千字文编号为当朝皇帝年号，有清一朝均用此制。

隋以后各朝还陆续从称谓上、形制上强化官印的权威性和等级差别。唐朝中期起将皇帝“玺”改称“宝”，为强调皇权为天所授，宋正式将帝后印的传统螭虎钮改为龙钮，并载入史册。对百官印，从唐代起就规定县一级以上官印称印，县僚属以下印章则不可称印而称“记”或“朱记”。金以后各朝又多明文规定官印的级差，官印的质地、大小、重量与官品高下成正比，王、太子、贵妃、高级将军的钮式更与一般官印所用的橛钮不同，而据其身份选用不同的瑞兽钮式。

总之，隋唐印系的官印具有全新的面貌，这个时期的官印制度经各朝不断的改进、补充，至清代，已比任何时期都要严整缜密。隋以后各朝注重官印的威严，而不在意印文的艺术效果，但唐官印的篆刻，仍然体现着其雍容华贵的风尚。宋以后官印的刻款，也无疑给后世篆刻家以极大的启迪，成为镌刻边款艺术的先河。

隋私印未见遗存，唐宋辽金私印除见于铃盖在当年书画作品的印文，还陆续见有出土的实物。传世品中，有的圆形“顿首再拜”、“谨封”印，从印文风格和刻铸方法考察，也可定为宋印。唐宋私印印文的基本风格与当时官印相近，有的虽用小篆入印，但也属仿古，在篆刻艺术上无太多的创意。然在这时出现了鉴藏印、书画款印、封缄印、印押等新的印章品类，在我国古玺印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

元代私印有大量遗存。其数量仅次于古玺和汉印。有汉字印、八思巴文印、元押，以及大量的花纹印。就印文性质而言，与商业有关的合同印的广泛流行是其一大特色。元私印多为铜质，印体比官印小，较薄，形状多样，除了传统的方形、圆形外，还有葫芦形、瓶形、元宝形，及各种动物形。钮式多薄片状鼻钮，也有人钮、兽钮等多种动物形钮。印文或图案花纹与印体一同铸出，印面布局随形而异，设计巧妙。不少印文四周还刻有人、鼎、琵琶、鱼、花草图案，具有很强的装饰趣味。千变万化的押字，在古玺印长河中更是独树一帜。

今遗存的元代私印绝大多数都为平民百姓所用。这些印章无论是外形还是印文的篆刻风格，均与同时期官印大相径庭。这一现象是亘古未有的，是元朝人对刻板乏味的官印九叠篆的厌恶和实际批判。与此同时一些文人如艺术大师赵孟頫等也在探索印章艺术的规律，他们对当时民间印章艺术的审美取向是否定的，大力倡导质朴的汉印

风范。学者吾丘衍从理论上剖析汉印的篆法，梳理出一套治印的正确规律。书画家王冕更首创用花药石治印，创作出具有独特面貌的篆刻作品。从此，我国官私印章篆刻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千余年同步发展的时代结束了。元朝文人对汉印艺术的研究、提倡，并直接从事篆刻艺术的创作，是明清篆刻艺术兴起并空前繁荣的先声。

（原载《中国美术篆刻全集·中国玺印篆刻全集》，上海书画社，1999年版）

古印收藏与古印收藏家

我国各个博物馆几乎都藏有古印，这些古印除少量为近年出土外，多数是传世品。譬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玺印，就基本是传世品。这些传世古印，其中清宫旧藏仅占很少部分，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收进来的，而后者又主要是原著名收藏家的藏品，如陈介祺的万印楼等，有十余种之多。可以说，没有前人历尽艰辛的搜集，精心细致的呵护，就没有今天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丰富的古玺印藏品。我们今天能看到那么多珍贵的古印珍品，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古代的收藏家。谨写此文，以表对古印收藏家崇敬之情。

一 古印收藏的几个阶段及其中的代表人物

1. 宋代——发端期

古印收藏发端于宋代，它的出现与当时金石学的兴起密切相关，一些金石图录，如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就载有古印 37 方。宋代有古印专书，如北宋崇宁、大观年间晁克一编的《印格》。^①南宋王顺伯（字厚之，号复斋）考订的《汉晋印章图谱》、颜叔夏的《古印谱》（颜叔夏一作叔夜，明徐上达《印法参同》记其编古印谱事）、姜夔（约 1155～1221 年，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的《姜氏集古印谱》等，他们著录的不一定都是某一个人的藏品，而可能是从各类图籍著录的印章摹录过来的。譬如《印格》张文潜序谈到晁克一编辑《印格》的方法时就有“悉录古今印玺之法”的文字，清楚地说明《印格》所录古印来源于当时的图籍。晁克一摹录古印的图籍，当然不会仅仅是官书，应也包括民间图书，而后者著录之印章，多属私人藏品也是确定无疑的。目前虽无资料说明宋代已出现了古印收藏大家，然从《啸堂集古录》、《印格》张序，确已显现出私家收藏古印的端倪。

2. 元明——温热期

古印收藏在元明时期逐步升温，这一文化现象是当时出现的篆刻艺术复古思潮激发起来的。有元一代，我国的篆刻艺术曾走入歧途。人们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花鸟之象”泛滥^②，秦汉印章古雅质朴的神韵荡然无存。这

是对传统篆刻艺术的叛逆，是文人士大夫所无法容忍的。他们认为出现这种不良的印风，主要原因是人们看不到古印，不了解古代篆刻艺术的精华所在。于是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鸥波、水精宫等，谥文敏，宋宗室后裔）毅然据友人程仪父收藏的古印打本，编辑《印史》一书，其用意是要让世人看看真正的篆刻艺术究竟是什么样子，以便“好古之士，固应当于其心”，有一个符合心意的范本。并希望那些俗不可耐的“好奇者”们看了此书后，能“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③。接着，吾丘衍（一作吾衍，字子行，号贞雪居士，又号竹素，浙江太末人）出版了其学术专著《学古编》，提出篆刻印章的三十五条原则，即三十五举。书中详论书体正变，特别强调学好包括篆书在内的古代文字对于篆刻之重要，其对汉魏印章基本特征，及有关篆刻方法的叙述，更是前所未见的。《学古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篆刻印章的正确方法，作者力图从方法论角度，改变当时媚俗的印风，它和赵氏的《印史》及其中自序提出的主张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在当时士人领袖的大力倡导下，在业已萌发的复古氛围影响下，古印收藏也就随之热腾起来了。

元代私家集印的升温体现在集古印谱的数量上，据罗福颐先生的《印谱考》记录，元人的集古印谱，除先前提到的赵氏《印史》外，尚有杨遵（宗道）的《杨氏集古印谱》、吾丘衍的《古印式》、吴睿（孟思，号雪涛散人，杭州人）的《吴氏印谱》、叶森（景修）的《汉唐篆刻图书韵释》、沈闰卿的《沈闰卿刻谱》、《申屠致达集古印章》等，明显比宋代多了，也反映出热衷古印收藏的人多了。但是当时收藏家的名字多未记录下来，譬如赵氏《印史》的古印来源，我们就只知道提供打本的人叫程仪父，而不知道真正的藏家。赵孟頫《印史》自序谈及编辑该书缘起说：“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假以归，采其尤印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赵氏仅记录提供打本的程仪父，而未记原印的藏家，是很令人遗憾的。

目前确知的元代古印收藏大家是杨遵。明顾氏《印薮》录有《杨氏集古印谱》序二通，其一为襄阳王沂（师鲁）撰，文曰：“蒲城杨遵，雅性好古，蓄古印甚富，虑夫物之有形，必有终弊也。乃捫捫其家与好事者所藏，摸其文为集古印谱。”据王序，《杨氏集古印谱》虽属摹本，然其来源主要为杨氏个人藏品。杨遵为元代古印收藏大家是确定无疑的。杨遵为元末明初人，原籍蒲城，字宗道。翁大年《古官印考补》记其行状曰：“遵元遗老，复徙钱唐，明洪武中以荐记官至镇江守。能抚流亡，有循声。”

在赵松雪等艺术大师的提倡和影响下，至明，文人治印蔚然成风，而且以汉印为本也成共识。在这种氛围中，古玺印就成为社会的需求，古印收藏热起来了，出版古印谱也成为时髦的事情。

明代著名的古印藏家主要有：

顾氏家族。顾氏家族是指御医顾世安及其后人，顾氏藏印的基本来源是宋元人的旧藏，譬如前述王厚之考订的《汉晋印章图谱》所收印文的原印，至明就全部售给了

顾氏。^④明代有两部著名的古印谱，一是顾氏《集古印谱》（黄姬水序署隆庆辛未，然则此谱成书于隆庆五年，即1571年。此谱可称隆庆五年本。原印拓出），另一称《印薮》（此谱前署太原王常延年编，武陵顾从德校，王穉登序有“万历三年武陵顾从德刻集古印谱”之语，知此谱刻于万历三年，即1575年，摹刻）^⑤就是顾氏家族藏品及其友人藏品的结集。另外，明《苏氏纂集集古印谱》、隆庆六年《集古印谱》（隆庆六年本）也与顾氏集印有关。^⑥最先记载顾氏藏印情况的，是黄姬水给隆庆五年本《集古印谱》做的序言，其后《印薮》录隆庆六年本顾氏《集古印谱》沈明臣（字嘉则，号四明山人）作的序也有记载。沈序曰：“上海顾氏称世家，三世以博雅传。自御医公世安氏搜购始，及光禄君汝由、鸿博君汝修、大理君汝和、光禄子天锡，历子孙父子兄弟绵远矣。而搜购远近不遗余力，乃仅仅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然较之诸家所藏则三倍矣。”顾氏集印经历了三代人，其藏印前后编订出四种印谱，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其中又以《印薮》影响最大，正如朱简在《印品》自序中说：“迨上海顾汝修《集古印谱》行世，则商、周、秦、汉杂宋元出之，一时翕然向风，名家辈出。”顾氏三代人坚持不懈搜集古印的精神，尤其令人钦佩。

明朝另一位著名的古印收藏家是范大澈。他是四明人，字子宣，号灌园叟。晚年命其子汝桐协助将自己收藏的古印编辑《范氏集古印谱》，于万历庚子（1600年）成书。范氏于嘉靖己酉（1549年）二十六岁时进京，而后“奉使滇南秦晋辽左诸边”，所到之处，搜集“书画碑帖，三代秦汉器识”。至六十二岁时，藏印竟达“三千六百有奇”。范氏晚年生活坎坷，藏品或为“白蚁所蚀”，或被奸奴偷盗，仅存古印，致使他十分懊丧，昔日“豪兴消耗尽矣”。终于悟到“古今宁有不散之聚”的道理，怕自己千辛万苦搜集来的古印，也像其他藏品一样散失，于是立刻“命儿女汝桐集为一部”，让儿子汝桐将所藏古印编为一部印谱（参看《范氏集古印谱》范大澈自序）。范氏集印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时四十余年，就个人而言，时间跨度之长，集印地域之广，所集古印之多，对古印之热爱、痴迷，在明代是无人能比的。范氏所收印章数量比顾氏多一倍，官印达五百八十方，尤为可观，然其名气却比后者小得多，究其原因，大概是其成书晚，流传不广，以及无人摹刻之故。瞿氏《古官印考证·谱录》谈到此谱时说：“六舟行脚至四明所得，则恐他处欲求全书更难矣。”可知此谱在清末已不易求，习印史者也罕有提及范氏。然就范氏印谱与顾氏印谱比较而言，顾氏《集古印谱》钤印本，仅二十部，传世极少。后人所见之顾氏《集古印谱》，实为顾从德所编之《印薮》，此谱乃摹刻，与原印拓出的《范氏集古印谱》是无法比类的。人知有顾氏集印，少知有范氏集印，尽管事出有因，然范氏在印史上之地位不应磨灭，其对收藏之执著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著名的古印学者郭宗昌（字胤伯）也是一位古印收藏大家，在万历年间，其“购求古印章最力”，所获亦多，遂于万历戊午（万历四十六年）由友人王朝麟协助，“拓之成帙”，将其藏品辑为《松谈阁印史》刊行^⑦。郭氏是一代古印学宗师，其周围聚集

着一批痴迷古印的崇拜者，“诸凡剖腹于贾胡，忘饥于鉴尝者咸集之”。影响之大，成就之高，诚如王朝麟序《松谈阁印史》所评：“又有胤伯其人，印章之道于斯中兴矣。”

3. 清——鼎盛期

古印收藏为金石学、篆刻艺术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资料基础，而后者的发展又促进了古印收藏的繁荣。至清，金石学兴盛、篆刻艺术名家辈出，古印收藏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

清代的古印收藏可分宫廷收藏和民间收藏两类。

(1) 清宫收藏

清皇朝也和宋皇室一样热衷于金石书画等古代文物的收藏，古玺印作为金石一类，自在收藏之列。清宫收藏古印历史悠久，然始于何时已难于查考，正如乾隆帝《御制古铜章歌》所云：“谁搜奥衍金薤珍，藏皮已久典内人。”清宫藏印以乾隆朝为盛，原因与乾隆的认识有很大关系，他在上引《古铜章歌》中说：“鸟遗神迹皇颡循，书传六书篆最真。岫嵒石鼓传鸿文，依稀星斗悬高雯。求其近是当于秦，汉承其法征据陈。拨蜡铸金镌泐匀，封邑爵号犁然分。诂惟鉴古怡心情，藉考数千年革因。”乾隆帝认为，收藏古印，不仅仅是为了鉴古，怡情养性，主要是因为秦汉印文字离古文最近，保存篆书最多，保存古代职官爵号又十分丰富，是了解和学习古代文字，特别是篆书，以及古代官制沿革很有价值的资料。乾隆帝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这也是当时学界对古印认识的主流。乾隆十六年，内府藏古器物图录《西清古鉴》编成，乾隆即敕命蒋溥、汪由敦、嵇璜、董邦达、观保、钱维城、于敏中等据宫藏古印编辑《金薤留珍》。此谱选官印二百二十一方，私印一千零七十方，以古玺、秦汉印为主，另有少数宋元印。其后，民间部分藏印也陆续流入宫中，因又编《毓庆宫藏汉铜印谱》，此谱收官印十二、私印八十八枚。

(2) 民间收藏

文人士大夫是清代藏印的主力军。清代民间古印收藏又可分作三个时段。

①清初，著名的古印收藏家有：

庄澹庵，毗陵人，藏古印二千余，曾侍读，故其将所集古印定名为《漆园印型》。十三卷。庄氏集印情况，及其后归属，见《话雨楼碑帖目》卷一所载张廷济作的毗陵庄澹庵侍读所集《漆园印型》跋，及许槌作的盛泽王旭楼先生藏《漆园印型》序。张跋说：“毗陵庄澹庵侍读所集《漆园印型》，先秦汉玉玺印，次铜官印，次姓名私印，次未识古印，凡十三卷，二千二百八十二钮，盛泽王氏话雨楼藏品。”许序说：“集此者为毗陵庄澹庵侍读，故系以‘漆园’。侍读既没，而话雨楼主人得之，一传而及旭楼，先生以先人之尤宝爱此也。”庄氏藏印甚精，而《漆园印型》也是康乾时期印谱中的佼佼者，张廷济跋评论当时的印谱说：“余观秦汉印谱，明上海顾氏所集印，印止二十部者，古玉印以百计，诚为古今独绝之品。顾后稽古斋印谱至五千零。天都汪氏集古印存，亦至数千，然稽古失之太密，汪氏晶石杂揉，失之太乱。查氏铜鼓书堂、张